



● 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

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 著
戴扬本 评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 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

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 著
戴扬本 评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醒狮丛书

谢俊美主编

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著 戴扬本评注

责任编辑 张燕萍 责任校对 张志生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215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00 册

ISBN7-5348-1718-8/C·13

定价:13.00 元

《醒狮丛书》总序

《醒狮丛书》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里我想说几句话。

1997年冬,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郭孟良先生和张燕萍女士风尘仆仆从郑州来到上海,邀我主编一套有关介绍近代思想家名著方面的丛书,想以此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近代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他们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想法非常好。其实,江泽民主席近几年来一直要求我们加强近代史的学习,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们的编辑计划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鉴于此,我虽不才,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我想要说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什么要不惜花大力出版这类盈利不多的著作呢?我想自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一番道理。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历史研究乃至出版计划,往往都是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再到历史中寻求答案。随着社

会历史的飞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不少人对于历史知之不多。由于多数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变局”,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理论上的探讨,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多次出现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现象:八九十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先是鼓吹新儒学,大倡文化复兴,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建设的动力。苏联解体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又鼓吹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方法论,乃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理论,也不顾这些理论原生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一股脑儿地介绍到中国。其中有些理论、主张由于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合中国国情,很快退出了文化舞台而销声匿迹。不过,透过这些言论、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仍然没有超越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这一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思想文化领域的中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深化,是国人在国门打开后,有鉴于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深感自己落后,急于寻求迅速改变现状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争论的表层好象是现代化问题,实际内里还是一个如何看待西方的近代文化和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问题。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拍击中国的堤岸,进行殖民侵略,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从船炮器械到声光化电之类的科学技术,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到民主、人权乃至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并日渐同

中国传统的文化发生抵触乃至冲撞,由此而引发了中西文化之争。由于民族战争的一再挫败,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承认和看到了西方的长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学习西方这一著名的历史课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围绕着学习西方,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先后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西折衷调和、全盘西化等等主张。这些主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都是在近代中国国情制约下,特定思维模式的产物,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因“世变之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

翻阅历史,我们发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常常为新的主张而陶醉,又常常为每一次新的迅即失却而变得痛苦不堪,并为企盼下一个更新的主张而激动不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采西学议”,王韬、郑观应公开鼓吹设议院,而容闳则干脆将他所了解和学到的西学知识投诸于他的斗争活动。然而随着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人们对“中体西用”产生怀疑。在国家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立场,译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搬来了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向人们大声疾呼:若再不变法,中国难逃“优胜劣败”、弱者灭亡的厄运。由此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谭嗣同则提出冲决一切罗网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维新变法,孙中山等发动和领导了反清

的辛亥革命,企图“西体中用”,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拯救民族危亡。然而变法的失败和革命的天折,又一次使他们陷入痛苦和悲哀之中。在流亡异国的日子里,康有为撰写了《大同书》,企盼大同世界的出现,然而他乃至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始终也未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楔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从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孙中山在屡经挫败后,重新构思新的建国方略。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则揭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出塑造现代人格的呐喊,主张实行观念形态的革命,进行文化重建。新文化运动中除旧布新的若干内容,时至今日还灼然有华。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每一场争论,时而给人以惊吓,时而又给人以力量。这种争论构成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绚丽多彩的画卷,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史上的中西文化之争早已有了结论。历史告诉人们,东西方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各有其成就和局限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近代史上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真理而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评判,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只是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而言,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落后于生活,接受和吸纳西方的近化文明是不可规避的事实,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探索,直到五

四运动前夜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最高结晶——马克思主义。又经过三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最后实现了民族独立,成功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斗争活动以及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和见解、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我想这大概就是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意图吧。

最后,从编辑本丛书而联想到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问题。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忧危国家的前途命运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个人的历史可以有轻浅,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大业犹如大海巨川,波澜壮阔,汹涌向前。人文知识分子不应为目前的困难惆怅和忧伤,不应弃守自己的阵地,应当像历史上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的呻吟和独立富强的热望交织中,毅然决然投身社会,追踪时代,大胆探求真理。社会经济运作机制的大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种守恒力量,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重塑自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重建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让我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共同努力吧。

谢俊美

1998年1月于沪上

目录

醒狮丛书总序·····	谢俊美(1)
冯桂芬与《校邠庐抗议》·····	戴扬本(1)
冯桂芬的生平·····	(1)
冯桂芬的思想·····	(13)
关于《校邠庐抗议》的评价·····	(54)

上 篇

自序·····	(67)
公黜陟议·····	(72)
汰冗员议·····	(76)
免回避议·····	(82)
厚养廉议·····	(85)
许自陈议·····	(89)
复乡职议·····	(91)
省则例议·····	(95)
易胥吏议·····	(99)
变捐例议·····	(102)
绘地图议·····	(105)
均赋税议·····	(108)

稽旱潦议·····	(111)
兴水利议·····	(112)
改河道议·····	(116)
劝树桑议·····	(120)
壹权量议·····	(123)
稽户口议·····	(125)
折南漕义·····	(127)
利淮盐议·····	(131)
改土贡议·····	(135)
罢关征议·····	(137)
节经费议·····	(141)

下 篇

筹国用议·····	(147)
重酒酤议·····	(150)
杜亏空议·····	(152)
收贫民议·····	(154)
崇节俭议·····	(157)
复陈诗议·····	(160)
复宗法议·····	(166)
重儒官议·····	(172)
变科举议·····	(177)
改会试议·····	(184)
广取士议·····	(186)
停武试议·····	(188)
减兵额议·····	(193)
严盗课议·····	(195)

制洋器议·····	(197)
善驭夷议·····	(205)
采西学议·····	(209)
重专对议·····	(214)
以工巧为币议·····	(217)
用钱不费银议·····	(220)

附

均赋议·····	(229)
裁屯田议·····	(236)
寓兵于工议·····	(241)
通道大江运米运盐议·····	(245)
借兵俄法议·····	(247)
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250)
垦荒议·····	(254)
太湖收船议·····	(256)
银钞议·····	(259)
变通钱法议·····	(264)
变通淮盐议·····	(266)
沙田弭讼议·····	(268)
后记·····	(270)

冯桂芬与《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的生平

1894年—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再度陷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

《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失败和屈辱,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痛苦的思索,开始改变起自己对外部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人们在被视作天经地义的事物中探究失败的原因,冷静地审视着自身衰变的过程。这种在痛苦的刺激下引起认识上的升华,促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以及自身认识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失败的刺激一旦转生为理性的思维,便成为即将到来的变法运动的起点。

正当变法和改良的要求在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并且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股潮流的时候,一本薄薄的小书也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这是一本总共不到8万字的小书。从形式上来看,不外乎古人议论时事的传统,正如左宗棠为本书撰写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使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类似汉代贾谊在他那著名的《治安策》中的风格,遍举当前事势,发出“可为痛哭者、可为流涕者、可为长太息者”的深沉叹息。作者分列数十个题目,每题各为一个篇章,引经据典,阐述自己对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的想法。与传统士大夫稍有不同的地方是,作者在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的同时,也援引了一些被称为“西学”的内容,虽然内容十分有限,在当时的士大夫议论中,却还是显得有些特别。三十多年前,太平天国农民军攻下了苏州,作者被迫避兵上海,又正逢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际,内忧外患,无以复加,有感于当时形势危亡,撰写了此书。书成之后,曾抄录了若干副本,在一部分对“洋务”感兴趣的士大夫中间传抄和阅读。作者去世十余年之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书中阐述的内容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遂开始频频加以刻印,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光绪十五年(1889年),翁同龢把这本书推荐给光绪皇帝阅读,希望书中鼓吹的改革思想能够对他有所启迪。光绪将它带入宫中后,置于案几,时时加以研读,深感书中所论“最切时要”,对自己很有启发,并将其中与时政有着密切关联的《汰冗员》、《许自陈》、《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驭夷》等六篇抄录成册。《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翁同龢欲辅翼光绪筹谋新政,冀匡时变,并以帝师的身份访问康有为,商议变法事宜。及至百日维新运动高潮之时,光绪皇帝谕令直隶总督荣禄将该书刷印一千册,并下发给军机、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及各省督抚、将军,命令他们阅读之后,签注上自己的意见,或者加以逐段评论。

这样一来,这本小书便成了维新士大夫的重要参考读物。此后,随着该书在社会上的流传愈益广泛,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

到了 90 年代变法高潮的时候,在一些人看来,其价值甚至可以与《盛世危言》、《庸书》等书相比,几乎成了当时变法改良思想库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后人在论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结合当时思想界的形势,对于此书的流传及其影响作过这样的评价:“言人所难言,实为 30 年变法之萌芽”。

这本著名的小书,便是冯桂芬撰写于 1861 年的《校邠庐抗议》。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校邠庐抗议》(以下简称《抗议》)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令人瞩目的著作,尤其是它那略显奇特的流传过程,更使得人们不得不对之有所关注。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变迁迅即的特定时代,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到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产生,人类社会历史上本来经历了几百年发展的历程,在近代中国却被压缩到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在这期间,本来就是极其纷呈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想,再加上这急促短暂的行程,往往使人产生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一种思想理论,从它的出现,到它被另一种理论取代,由于社会思潮本身新陈代谢过程的迅速发展,常常只是在一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

然而,在各式各样的政治论著中,这本《校邠庐抗议》的流传现象似乎是个例外。在冯桂芬去世之后,它的广泛流行,以及它在社会上的影响,竟然都持续到了 19 世纪末叶,这是许多同类著作不能相比的。这固然说明,作者在书中表达的某些思想和观念,在经历了 30 年光阴之后,依然能够叩动时人的心弦,而当时社会特定的诸多因素,比如各个阶层的人们,以不同的视角,在社会动荡分化之际,对变革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倘若我们能对作者的身世和经历进行一番追索,对作者在书中阐述的论点作一深入的研究,包括对该书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进行一次归纳和总结,无论是对这段历史作进一步的研

究,还是探索近代思想演变的轨迹,无疑是令人感到饶有趣味且极有意义的一件工作了。

冯桂芬(1809年—1874年),字林一,又字梦奈,号景亭,江苏吴县人,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他出生在江南地区的一个地主家庭,从他自己所说家有“薄田十顷”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且禀资颖异,“读书目数下”,似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优裕的生活条件,又使他得以博览群书,通晓经史,很早便以才学负名一时。冯桂芬23岁中举之后,常常来到座落在苏州的紫阳书院和正谊书院,听一些著名学者的讲学,其时,担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也是书院的主讲者之一。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林则徐是最先开始注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解和研究的先进人物之一。此时,距离鸦片战争还有大约七八年的时间,林则徐尚未有过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和体会,当然还谈不上他后期思想中通过了解“夷情”,来窥视“天朝”以外世界的观念。不过,林则徐在学问上讲求“经世致用”的思想,无疑对冯桂芬的治学态度和追求学问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君于学无所不窥,而期于实用。天下大计,无日不往来于胸中,其于河漕兵刑盐钱诸政,国家条例源流,洞达而持之介然。”(《显志堂集·李鸿章撰墓志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抗议》诸篇的阐述中,冯桂芬常常援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古今制度沿革的研究心得,与清代的科举、漕运等制度加以对比和分析,而顾炎武正是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相倡的著名学者。

因此,如吴云在为《显志堂集》撰写的序言中所言,冯桂芬在治学门径上,很早便已经表现出一种不同凡俗的气象,读书“不屑以章句自囿,举凡天文、舆地、兵制、刑法、盐铁、河渠、钱漕、食货诸书,靡不极虑专精,务欲推究其本原,洞徹其微奥,隐然负拨乱澄清之志。”(《显志堂集·吴云序》)同时,对于传统士大夫的学问,他也有着

自己的独到之处，“经史而外，天文、輿地、算学、小学、水利、农田，无不精究，而尤谙于历代掌故，于文无所不长，诗古文辞、骈体制艺，无不卓然自成一家言，而尤达于经世之学”。（《显志堂集·吴大澂序》）“未达时即以文名”，在他尚未正式步入社会之前，便以自己的才学而知名一时了。

这种独到的治学方法，使得冯桂芬在知识结构上，也显得与众不同。正如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我们从他留下的著作来看，既包括有显示了厚实的传统学术底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精研小学，尝手摹楚金说文韵谱，叙而刊之”，又有一些十分注重经世之学的著作，“喜畴人家言，师事李申耆、李尚之两先生，尝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罗经，用以步田绘图，试行於川沙。又以江南清丈用部颁五尺步弓多溢额，考《会典》、《皇朝文献通考》及户、工事例，定用旧行六尺步弓量旧田，新颁五尺步弓量新涨沙田。”（《显志堂集·李鸿章撰墓志铭》）这种知识结构，使冯桂芬成为既精通典章制度沿革，同时又具备处理实际事务能力的复合型知识分子。

在冯桂芬性格中，除了表现为对时势隐忧的深沉，还有着激昂的一面，“澄虑寡言，及临大事，决大疑，往往慷慨激烈，直任不辞。”我们从他青年时期的一些举止行为上，可以感觉到他那疾恶如仇的性格，和宁折不屈的品质。冯桂芬早年曾经担任过某县令的记事，这是一种类似文书的工作，同时还兼管钱粮方面的事务。有一次，一个生员因为境况窘迫，欠粮未交，县令不分青红皂白，硬要夺去生员的资格。冯桂芬觉得县令的这种做法过于苛刻，便尽力为之说情，最后，力争不得，一气之下竟拂袖而去。所以，在他尚未出仕做官的时候，冯桂芬便以这种刚正不阿的名声，名重大江南北了。

正是这些原因，冯桂芬当时表现出来的学问和识见，深得林则徐的赞赏，“学问文章，受知于文忠最深，有一时无两之誉”。（同上）

而且,从记载来看,冯桂芬当时虽然是以学生的身份,却已经带有幕僚的色彩,参与一些事务的处理,偶尔还得以“侍饮先师林文忠公署”。(《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19世纪30年代,林则徐在担任江苏巡抚的时候,深深感到江苏一带漕粮积年弊端之重,曾经上疏请予缓解一二分或三四分,以与民休息。冯桂芬由于当时十分注重江南漕运问题的研究,耳熟稔知其中种种细节,后来,到了同治年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解决苏松太地区浮粮问题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便是依靠了冯桂芬对道光、咸丰年间三十余年漕运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将实征的记录一一加以比较,最后确定议减三分之一,上疏朝廷。这些工作,都是出自冯桂芬之手,充分显示了他在处理政务方面的才干。这件事情的处理,和同治元年对迎接皖军至上海解围一事的筹议,使冯桂芬成为东南地区以政务干练著称的人物。

从科场上的经历来看,冯桂芬十分顺利。继23岁中举之后,过了8年,也就是31岁的时候,他又通过了进士考试,而且荣登“榜眼”,即取得了名列本次会试第一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仅次于状元。这使得他的声誉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大为提高,并为他日后进入社会上层的活动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社会政治活动生涯。

冯桂芬曾经担任过编修,担任过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不久,又改广西乡试正考官,教习庶吉士。后来,因为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回籍丁忧。从表面上来看,这不过是因为遵从体现封建礼教的制度,然而,对冯桂芬来说,恐怕还有着另一种意义。我们从一些文字的记载来看,此时,他虽然涉入官场不过1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他那刚直的禀性,常常使他陷于某些困窘中,以致他发出了“固宜绝口不挂时政”的感叹。他深感自己难以适应官场的习气,“登第后服官不及十年,即引疾归,徜徉山水,萧然自然,俭约廉静,旁无姬侍,而遇事则奋发勇于有为。”(《显志堂集·李鸿章撰墓志铭》)丁忧正